

# 民主化與對敵國政策： 台灣與南韓經驗比較之初探

關弘昌

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後研究員

## 摘要

民主化如何影響一個國家對外政策（尤其是對敵國政策）的衝突合作程度在近年來是國際政治學者們關注的議題之一，本文的目的即在於嘗試針對台灣與南韓的經驗作一初步探究與比較。台韓兩國在內外環境或發展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二次大戰後的威權統治與一九八〇年代晚期開始的民主轉型。但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差異是，在民主轉型過程完成後的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到二〇〇七年為止，雙方在對敵政策的方向出現了不同的發展：台灣逐漸出現挑戰中國的動作，而南韓則對北韓展現出更為友善的政策。本文以為，這主要是台灣與南韓在經歷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分別在各自內部的「認同政治」發展方向不同所導致的一個對外政策結果。

關鍵詞：民主化，台灣，南韓，兩岸關係，兩韓關係

\*\*發表於國際關係學會 2008 年年會暨「台灣與國際關係的新紀元」學術研討會，2008, 5, 10，台北。

## 一、前言

台灣與韓國在最近二十年的內外發展方面，是兩個具有相似經驗的個案。在內部政治發展方面，台灣及韓國在一九八〇年代同樣歷經了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體的過程。而在對外關係上，台灣經歷了兩岸關係於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以來的轉折，包括起初的交流對話，一九九五及九六年的台海危機，還有「兩國論」、民進黨政府推動公投等引起的緊張局勢；南韓則是在經過四十多年與北韓的彼此相互對峙後，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逐漸改變對於北韓的態度與政策，並在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出現具有和平色彩的「陽光政策」。台灣與韓國的民主化過程分別如何影響各自的對敵國政策？它們之間具有哪些異同之處？本文的目的乃在於針對這些問題作一初步性質的討論。<sup>1</sup>

## 二、民主轉型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關於民主轉型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學界基本上存在著兩個不同的觀點。第一個觀點是，一個國家的民主轉型容易導致它在對外政策上出現激進的傾向。例如 Mansfield 和 Snyder (1995) 指出，正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很常見到的一個現象是這些國家出現了好戰或激進的外交政策，甚至因而捲入國際衝突。他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當一個國家開始民主化的過程時，它內部的制度安排通常會變得比較薄弱而不穩，而且轉型過程中的輸家也會感到利益遭受威脅。而虛弱的制度加上利益受損的輸家通常容易造成一種國家機關權威蕩然無存、穩定的政治聯盟不能存在的政治僵局。因此政治人物容易傾向運用一些激進的策略以突破此種僵局，但是這些策略則通常造成對外政策的激進化，容易在最後導致對外衝突的出現。

第二個觀點則認為，正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也會出現和平的對外政策。例如 Lebow (1995)，McFaul (1997-1998)，以及 Malcolm and Pravda (1996) 都以前蘇聯末期或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為個案，說明一些因素，諸如最高領導者對於國內政經改革的執著、國際合作中獲得物質與規範利益的政治行為者、以及民意等等，使前蘇聯與俄羅斯在一九八〇年代末至一九九〇年代的民主轉型過程中並未引發重大的國際衝突，也沒有造成任何挑釁的外交政策出現。

因此，到底民主轉型會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和平或衝突取向，目前並無一個定論。這可能是因為每位研究者所採取的研究途徑或觀察的個案並不盡相同，同時各案例中發生作用的因素亦有所異之故。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對以上辯論中的任一方向作攻擊或辯護，而是要透過台灣與南韓的經驗比較，呈現出由於在某些條件方面的差異，民主轉型確實對於不同國家的對外政策方向會造成不同的作用。以下即先就台灣與南韓的案例作一介紹。

---

<sup>1</sup> 本文在韓國個案上所依賴之相關資料並非直接田野研究所取得，加以許多資料或資訊的無法尋得限制了論證的深度，因此僅是一個初步的、先導 (pilot) 性質的比較研究。

### 三、台灣與南韓的異同

台灣與南韓在二次大戰前後的歷史發展經驗有許多極為相似的地方。例如他們都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並且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一起脫離日本統治。不過不久之後他們都經歷國家內戰，並分別與中國大陸及朝鮮半島上的共產政權（中共及北韓）為敵，分別面臨生存與安全的挑戰，以及在國際上的中國/韓國代表權競爭。因此在冷戰的年代，他們同樣受到美國的支持及保護，並成為美國在遠東的反共盟友。在內政上，台灣與韓國一樣經歷了多年的威權統治，並且因為在經濟發展方面有極為耀眼的表現而共同躋身亞洲的四小龍。隨後在一九八〇年代晚期開始，這兩隻小龍又一起經歷了從威權體制邁向民主政治的轉型過程。

不過從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到二〇〇七年為止，兩國在各自的「對敵政策」或「與敵關係」上卻有不同的發展趨勢出現。雖然民主轉型期間台灣及南韓在大陸政策與北韓政策上都有所調整，分別對中國大陸與北韓展現善意，並因而分別改善了兩岸及兩韓關係，但是其後當台韓都完成民主轉型過程並向成熟的民主體制邁進時，兩個案例的發展卻出現差異：南韓在北韓政策上持續維持善意，最典型的案例是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出現的「陽光政策」；不過在台灣方面卻逐漸出現與中國大陸的摩擦並造成兩岸關係的緊張，這尤其可以在一九九五年與一九九六年中國大陸對台灣進行飛彈試射之後的時期可以看出。

何以同樣歷經民主化的台灣與南韓在後來會在各自的對敵政策方向上有所差異？筆者以為，這主要是台灣與南韓在經歷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分別在各自內部的「認同政治」發展方向不同所導致的一個對外政策結果。台灣與南韓的另一個類似點即在於兩者內部在威權統治時期即存在著國家定位或認同方面的分歧，也就是威權政體的統治者與反對者在如何定位敵我關係上有不同的觀點存在。不同的是，在台灣方面，以台灣籍人士為主的反對勢力主張的是一個「與中國分離」的台灣獨立路線，而在南韓的反對勢力則是主張「儘速與北韓統一」的立場。當兩國的民主化歷程在提供了這些反對黨參政乃至於執政的機會時，它們於是擁有機會與權力去企圖實現原有對於國家定位的主張。於是我們看到，朝野的競爭使台灣內部在民主轉型接近完成的階段時開始出現統獨議題的辯論，加上台灣惡劣的國際處境，台灣民眾逐漸改變他們對於台灣與中國關係的看法。於是當更多民眾具有台灣人意識，以及大多數台灣民眾不贊同立即與中國統一時，台灣遂逐漸出現挑戰中國主權觀的行動，從而引起兩岸關係的緊張。而在南韓方面，民主化讓反對勢力原來被壓抑的親北韓政策立場逐漸在國內擴散並影響執政黨，最後這些反對勢力透過選舉成為執政黨後終於有機會實踐其理念，從而出現和平色彩濃厚的對北韓政策。

#### 1. 台灣的個案

台灣在一九八〇年代晚期至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歷經民主轉型過程的期

間，確實在對中國大陸的政策上出現不同於以往冷戰時代的善意，一個和平取向的中國政策因而隱然成形。例如當時執政的李登輝不斷強調台灣的大陸政策最終目標是要達成與中國大陸的統一，他的政府並且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制訂「國家統一綱領」以顯示台灣追求國家統一的決心。由於對於「國家統一」目標的強調極為契合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期望，因此事實上它讓台灣當時的大陸政策呈現出一個相當和平的面貌。除此之外，李登輝也宣布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並持續開放兩岸之間的經貿、社會、以及學術文化上的交流。尤其是為了解決因兩岸交流而出現的一些問題，李登輝同意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進行多次半官方性質的事務性協商談判。這些交流與對話的出現也創造了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冷戰時代以來前所未見的和解氣氛。<sup>2</sup> 不過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民主轉型過程接近結束後，台灣逐漸出現刺激中國的動作，例如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訪美，一九九九年提出了「兩國論」；陳水扁執政後在二〇〇二年喊出了「一邊一國」，二〇〇三年則推動公投運動，二〇〇七年也提出「公投加入聯合國」的訴求。這些事件都引起中國強烈的反應，也造成了兩岸關係的緊張，因此可以算是具有衝突性質的動作。

要理解為何台灣在完成民主轉型後會出現這些衝突性的動作，就必須分析台灣內部的認同政治發展過程。國家認同議題在台灣展開民主化不久即已出現，而台灣內部對此問題的爭論事實上與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息息相關。國民黨在一九四九年後於台灣建立了一個威權統治的政體，在其統治之下不僅人民的公民權受到剝奪，即便是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亦因為國民黨透過教育與媒體所灌輸的大中國意識型態而遭到壓抑。因而對以台籍人士為主要成員的反對運動組織而言，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並建立一個民主與獨立的主權國家於是成為最重要的目標。<sup>3</sup> 台灣在一九七〇年代遭遇的外交挫折，例如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等事件，更讓反對運動認為台灣唯有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才能突破外交的艱難困境。因此，當民進黨成立時即繼承了反對運動追求民主與台灣獨立的目標。

不過在實踐民主與台獨這兩個目標時，民進黨是有先後之分的。一九八〇年代組黨前後反對運動主要的重心是在要求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令，廢除臨時條款回歸憲政體制，並全面改選國會等民主化議題。但是當李登輝與民進黨在一九九〇年國是會議取得共識開始推動政治改革之後，民進黨的訴求重點即向台灣獨立的主軸進行轉換，因為他們原有的訴求已被李登輝吸納，為了開闢新的戰場，反對黨必須另尋新的議題來與國民黨競爭。在此時，民主轉型已經使台獨言論的宣傳及其在媒體上的報導不再成為禁忌，而選舉更提供了反對黨大力宣傳台獨的舞台。於是在一九九一年國大代表全面改選的選戰中民進黨相繼提出「台灣憲法草

---

<sup>2</sup> Kuan (2007) 認為台灣在民主轉型時期中國政策的和平取向乃源於李登輝為確保個人政治利益而衡量現實條件後的理性決策結果，亦即對李而言最佳的政策選項是，「推動民主改革」優先於改變當初蔣經國設定的中國政策方向，即一個中國與兩岸交流。

<sup>3</sup> 本文提及的反對運動指的是包括在台灣及海外以台籍人士為主的反對運動。當然在威權時期也曾短暫出現不主張台獨、不以「省籍」為成員共同背景的反對運動，例如雷震的自由中國，不過台籍人士的反對運動畢竟在威權體制轉型前後持續存在，也對台灣的政治發展有更深遠的影響。

案」與「台獨黨綱」，並且以一系列活動推動了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訴求。固然民進黨在國大選舉中的挫敗被視為其台獨路線的失敗，但是「加入聯合國」的訴求卻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sup>4</sup> 這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事實上送出了一個強烈的訊息，也就是台灣民眾對於台灣外交處境的不滿無奈與重返國際社會的期待。外交處境惡劣是國民黨政績的弱點，因此李登輝在完成政治改革的主要工程後隨即將重心放到拓展台灣的國際關係之上，例如他在一九九三年春宣布了「參與聯合國」的政策，並且在一九九四與九五年出訪了幾個友邦與無邦交國家，其中以九五年六月的訪問美國最為重要。

現在看來，李登輝的訪美不僅對兩岸關係造成立即的影響，也進而對台灣內部認同政治的發展演變產生極重大的作用。一方面，這一訪問引發中國對台灣發動飛彈試射演習，導致八〇年代末期以來兩岸的和解氣氛消失殆盡。另一方面，中國對台灣的外交打壓與飛彈演習也讓台灣人民對中國產生負面觀感，民眾的「台灣人認同」在一九九五年中以後已經超過了「中國人認同」。<sup>5</sup> 不過必須一提的是，外交或中國這些外部因素所以可以影響台灣內部的認同政治，不可忽略的是台灣民主化所帶來最重要的一個機制，也就是選舉。選舉的舉行在初期曾提供了反對黨宣揚台灣獨立理念的機會，例如一九九一年國大選舉的例子所顯示，不過在後來當民眾的國家認同分布出現轉變之後，選舉卻成為導引朝野政策的一個因素。因為為了贏得選舉，政治人物或政黨必須察覺民眾的政策偏好，在選舉時提出迎合選民偏好的政策語言或行動，以爭取選票的極大化。所以當民眾對外交局勢不滿，或其「中國人認同」急遽下降而「台灣人認同」快速上升時，李登輝必須進行上述的外交行動，他與陳水扁也必須在選舉來臨前提出彰顯台灣主權獨立但對中國具衝突性的言論或動作。於是台灣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後挑戰中國主權觀的行動遂不斷出現，尤其是在選舉來臨之前。<sup>6</sup>

## 2. 南韓的個案

雖然南韓的民主轉型模式與台灣略有不同，<sup>7</sup> 不過在一九八七年年底總統直選後的轉型時期，我們也見到它在對敵政策上出現與台灣民主轉型期的中國政策方向類似的一個狀況，也就是對北韓的政策轉變。之前的威權政府，即朴正熙與全斗煥時期，雖然是主張要與北韓統一，但其基本的立場是堅決反共，必須經由消滅北韓政權來完成統一，所以它們對北韓採取敵視態度，反對北韓參與國際社會。<sup>8</sup> 這與台灣兩蔣執政時期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態度相當類似。而盧泰愚當選總統之後，一方面對內制訂新憲推動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對外則大膽採取與共黨國家

<sup>4</sup> 聯合報民調顯示有六成民眾支持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的訴求。見 Kuan 2006: 150。

<sup>5</sup> 參見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資料，相關網頁如下：

< <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TaiwanChineseID.htm> >。

<sup>6</sup> 有關此一台灣內部「選舉」與「對中國政策或態度」的關連的詳細分析，參見 Kuan 2007。

<sup>7</sup> 簡言之，台灣的民主轉型是經過一系列政治改革後才舉行首次總統直選，南韓則是由總統民選、盧泰愚當選揭開民主轉型序幕，接著展開主要的政治改革。

<sup>8</sup> 在此必須指出，朴正熙曾經短暫改變立場與北韓秘密談判，並於一九七二年簽訂聯合公報，亟求降低雙方緊張關係。不過因彼此互信不夠，南北韓的敵意最後並未能消除。見 Wood 1993: 191。

交往的「北方政策」(*Nordpolitik*; Northern Policy)，不僅與蘇聯、中共積極來往，也對北韓進行開放與交流。在一九八八年七月漢城奧運會舉行之之前，盧特別宣布他將放棄南韓傳統上孤立北韓的政策，並且提議南北韓之間進行貿易與其他接觸及合作。他也鼓勵南韓人民不再敵視北韓，而應將其視為是一個追求共同繁榮的伙伴。<sup>9</sup> 也就是從那時起，南北韓開始正式有了經貿往來。一九八九年盧並且提出了一個國協 (*commonwealth*) 構想做為南北韓未來統一的藍圖。而在一九九〇年南北韓雙方的總理也曾進行過空前的三次會談；一九九一年底雙方並且簽訂了一份基本協定，標誌了南韓放棄以往消滅北韓的企圖，而改以「和平共存」作為彼此互動的原則。盧對北韓的政策調整在相當程度上也和台灣民主轉型時期的李登輝在中國政策上展現善意與和解極為相似。不過與台灣不同的是，台灣在完成民主轉型之後逐漸出現了一些刺激中國的、具衝突性的政策或舉動，但南韓民主化之後的北韓政策大致上都延續了和平的基調，例如一九九三年接任總統的金泳三曾經決心建立一個與北韓和解及合作的新時代；<sup>10</sup> 他並且在就職時宣布願意與北韓領導人在任何時地見面。<sup>11</sup> 而在一九九八年金大中即位總統之後，這一和解的政策基調更為明顯。金大中採取了對北韓更友善的「陽光政策」，主張南韓不會試圖去削弱或併吞北韓，而且會主動積極地去推動兩韓之間的和解與合作。<sup>12</sup> 他更在二〇〇〇年訪問平壤，與北韓領袖金正日舉行高峰會。其後雙方政府針對建立軍事熱線、重新接通一條跨越兩國邊界的鐵路、以及擬定投資協議以保障在北韓投資的南韓企業等議題達成協議。<sup>13</sup> 後來二〇〇三接任總統的盧武炫的北韓政策上基本上也是被視為延續金大中與北韓修好的陽光政策路線。<sup>14</sup>

在民主轉型後的對敵政策上，南韓之所以會與台灣的個案出現差異，主要是由於它內部不同於台灣的認同政治發展途徑所致。與台灣的威權時期一樣，南韓在威權統治下一樣存在有反對政府威權統治、要求民主政治的運動，而且對於威權政府的「對敵關係」立場存有異議。不同的是，在台灣的反對運動所主張的台灣中國關係之中，台灣必須選擇獨立；而南韓的反對運動則認為，在南北韓關係上南韓必須更積極地與北韓統一。也就是說，台灣反對運動主張的是一個與中國分裂的國家認同，而南韓反對運動訴求的則是一個與北韓統一的國家認同。由於台獨是挑戰中國主權的極端主張，因此如上文所提，當台灣獨立的訴求隨台灣民

---

<sup>9</sup> Levin and Han 2002: 7-8。Wood 認為盧的政策改變有多重效益：向民眾展現他對統一的承諾並平息激進派在統一問題上的訴求，消除北韓的敵意，為南韓產品拓展市場，並且在提升南韓國際地位的同時削弱北韓的地位。見 Wood 1993: 193。Chung 則以為盧的政策可以避免北韓動員其共黨國家陣營的盟友杯葛漢城奧運，同時也足以緩和南韓國內那些不滿強硬反共意識型態的聲音。見 Chung 2003: 21。

<sup>10</sup> Levin and Han 2002: 20。

<sup>11</sup> Chung 2003: 24。

<sup>12</sup> 不過這兩個原則必須建立在另外一個原則的前提之上，也就是南韓不會容忍北韓蓄意的武力挑釁。見 Levin and Han 2002: 24。

<sup>13</sup> Chung 2003: 28。

<sup>14</sup> 中國時報，2008年4月4日。見中時電子報 <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4+112008040400496,00.html> >。

主化進程而或明或暗地被推動，並漸漸影響民眾與政治人物的態度時，台灣的對敵政策方向是逐漸趨向衝突的。而南韓反對運動的「極統」主張在執行面上的前提是要與北韓修好，因而本身就帶有和解與和平的要素。只是這一反對運動的主張是如何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形塑出南韓對敵政策的和平取向呢？

猶如台灣的反對運動在談民主時無法不提到台灣獨立，在南韓的反對運動中，統一問題也一直與民主化議題形影不離。相對於「保守派」，也就是執政黨或其他支持政府的人士，南韓威權時代的反對運動團體通常被稱為「進步派」(the progressives)，他們認為威權政府經常以北韓對南韓的安全威脅作為其壓抑人民政治權利、施行威權統治的藉口，因此他們主張要達成南韓的民主，就必須先結束南北韓的分裂。這是他們急切主張統一、要求改善與北韓關係的考量所在。後來民主轉型開展之後，他們便轉而推動原先主張的統一政策。<sup>15</sup> 就如同台灣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措施賦予了民進黨推動台灣獨立訴求更大的空間，盧泰愚在一九八七年六月曾宣布八點政治改革措施以作為他在當選總統之後推動民主轉型的改革依據，<sup>16</sup> 其中幾項直接或間接有利於反對運動「統一」主張在南韓內部的擴散。例如解除媒體管制使原先受到威權政府管控的媒體在數量上不斷增加，它們對於之前被禁止的統一或親北韓言論的傳播亦不再受到官方的干預。另外，盧也釋放了之前被囚禁的反對運動政治犯，這些反對人士出獄後自然依舊鼓吹他們所支持的北韓政策主張，例如金大中在一九九四年即成立一個「金大中和平基金會」推動韓國的統一。<sup>17</sup> 此外，南韓政府也不再禁止民間團體的成立，因此各種民間團體陸陸續續出現，而其中有許多是屬於過去被壓抑的進步派組織。<sup>18</sup> 當然，民主化也造就南韓政黨政治的形成，而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機制——選舉——不僅讓反對黨在一九八八年民主轉型後的第一次國會 (National Assembly) 選舉就獲得多數席位，從而對盧泰愚的北韓政策形成一定的壓力。<sup>19</sup> 而與台灣後來的政黨輪替一樣，選舉更在後來提供了南韓反對人士執政的機會，尤其是金大中的當選總統，這也成就了後來陽光政策的出現。質言之，民主轉型開啓了一個言論與行動的空間，使南韓反對運動在威權時期被壓抑的親北韓政策主張得以被廣為宣傳與推展。而且該主張不僅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盧泰愚政府的北韓政策，也在政黨輪替後正式成為南韓的官方政策，因而塑造了其對敵政策強烈的和平色彩。

#### 四、結論

從以上對於台灣與南韓在民主轉型後的「對敵政策」方向上的比較討論中，

---

<sup>15</sup> Chung 2003: 16。

<sup>16</sup> 此改革大致內容可見 Bedeski 1993: 65。

<sup>17</sup> Chung 2003: 28。

<sup>18</sup> Kong 2005: 197。

<sup>19</sup> 南韓一九八八年四月的國會選舉結果是，執政黨在全部 224 席中只獲得 87 席，其餘則為反對黨及獨立人士所囊括（其中統一民主黨 RDP 有 46 席，新民主共和黨 NDRP 獲得 27 席，金大中的和平民主黨 PPD 有 54 席，獨立人士 9 席）。見 Bedeski 1993: 67。

吾人可以獲得下列兩項初步的結論。

第一，在思考民主轉型如何影響對敵政策時，我們可以說不論是在南韓或台灣，民主轉型事實上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原先兩國內部遭到壓制的反對運動得以與執政黨在各種議題上作政治競爭，包括對「敵我關係」或者國家認同的主張。民主轉型是一個包含多種解放活動的現象，其中結社組黨自由的鬆綁給予了反對運動合法存在與活動的空間，而言論自由的放寬則賦予反對運動更大的動力去針對諸多議題提出那些不同於執政黨的意見，例如南韓反對黨倡議與敵國的統一，或台灣反對黨推動台灣自己本身的獨立。而選舉的舉行不僅得以讓反對運動藉由競選活動來宣傳其統、獨政策立場，或進而影響選民在該議題上的想法，並且也會造成執政黨的壓力或影響其決策，甚至進一步提供反對運動翻身執政的機會，進而名正言順地執行本身既有的對敵政策。

第二，雖然民主轉型在台灣及南韓提供給反對運動的機會是相同的，但是因為兩國的反對運動在「與敵關係」或者國家認同的分裂與否的主張不同，也就使後來兩國內部的認同政治及對敵政策發展路徑出現差異。透過民主轉型賦予的機會，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逐漸引導台灣內部出現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台灣認同，並且在中國政策上出現挑戰中國主權觀的言論動作；而主張與北韓統一的南韓反對黨則引導南韓內部逐漸形成「與北韓和平共存」的認知及政策。最後，當兩國原先的反對黨都經由選舉成為執政黨之後，台灣遂更常出現衝突性的中國政策，而南韓也就展現了更為善意的北韓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本文的分析僅就二〇〇七年之前台灣及南韓的個案進行分析，不過在二〇〇八年兩國將要或者已經有新的總統：台灣的馬英九與韓國的李明博。馬英九在選戰中主張開放兩岸交流並且擱置主權爭議，這是一個對中國友善的政策立場；而李明博的北韓政策則被視為改變其前兩任金大中與盧武炫的路線，變得更加強硬。是否未來兩國的對敵政策都會有新的翻轉及發展，將值得吾人予以密切觀察，也值得我們將其納入對於「民主化與對敵國政策」關係的思考。

## 參考書目

- Bedeski, Robert E. 1993. "State Reform and Democracy in South Korea." In *Korea Under Roh Tae-woo: Democratization, Northern Policy and Inter-Korean Relations*, ed. James Cotton. St. Leonards, Australia : Allen & Unwin, pp. 53-73.
- Chung, Chien-Peng. 2003.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Inter-Korean Rel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76.

- Kong, Pyungwon. 2005.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Republic of Korea (ROK)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ROK Alliance*. Ph.D. disser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 Kuan, Eugene Hung-chang. 2006. "Domestic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Explaining the Formulation of Taiwan's 'Participate in the U.N.' Policy." *Issues & Studies*, Vol. 42 No.1, March 2006, pp. 137-162.
- Kuan, Hung-chang. 2007. *Taiwan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1987- 2004*. Ph.D. dissertation, Government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Lebow, Richard Ned. 1995. "The Search for Accommodation: Gorbachev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ds. 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Kapp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vin, Norman D. and Yong-Sup Han. 2002. *Sunshine in Korea: The South Korean Debate over Policies Toward North Korea*. Santa Monica, CA : RAND.
- Malcolm, Neil, and Alex Pravda. 1996. "Democratization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72 (3): 537-552.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1995.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 5- 38.
- McFaul, Michael. 1997-1998. "A Precarious Peace: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3): 5- 35.
- Wood, Perry. 1993. "The Strategic Equilibrium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1990s." In *Korea Under Roh Tae-woo: Democratization, Northern Policy and Inter-Korean Relations*, ed. James Cotton. St. Leonards, Australia : Allen & Unwin, pp. 187- 217.